

第 1 章

功能语言学学科发展概览

当代语言学主要采用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研究路径。形式主义认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可以切割开来，因此，语言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探讨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不需要涉及这些成分的语义和语用性质；功能主义则认为，语言的形式与意义无法截然分开，因此，语言研究不但要研究音系、字系、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的本体，而且还要关注情景、社会、话语、语篇等语言使用的环境因素（黄国文、辛志英，2012）。功能语言学采用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则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其最重要的代表。

系统功能语言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创立以来，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到 20 世纪 80 年代理论体系基本完备，进入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同时扩展到世界上多个国家，被广泛运用于句法研究、话语分析、语言教育、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众多研究领域，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最重要

的一个学术流派。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得到学界的关注，发展迅速。胡壮麟等（1989，2005）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此之后，方琰、任绍曾、朱永生、张德禄、杨忠、杨信彰等一大批系统功能语言学者长期致力于该学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出版了许多经典学术论著，组织召开了系列学术会议，培养了一大批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学者，极大地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中国继续得到应用和拓

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发展包括:(1)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语篇分析,包括多模态话语分析(如黄国文,2004;张德禄,2009a,2015);(2)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加的夫语法)的功能句法分析(如何伟、廖楚燕,2008;黄国文,2008;黄国文、冯捷蕴,2002;张德禄,2011);(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如黄国文,2012a,2012b,2019;司显柱,2004);(4)评价系统理论的引介与应用(如李战子,2001;王振华,2001,2004;杨信彰,2003);(5)语法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丛迎旭,2014;范文芳,2001;胡壮麟,2004;刘承宇,2015;杨炳钧,2019;杨延宁,2020);(6)生态语言学研究(如何伟、魏榕,2017,2018a,2018b;何伟、张瑞杰,2017;黄国文,2016b,2017);(7)汉语的系统功能学研究(如彭宣维,2012;杨延宁,2020)等。

本章将首先综述20世纪功能语言学的主要发展,然后概述21世纪初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情况(2000—2009),最后介绍近十年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2010—2019),为后续综览新时代功能语言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提供理论背景和铺垫。

1.1 20世纪功能语言学主要发展综述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为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自20世纪60年代初创立以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经历了阶与范畴语法(如Halliday,1961)、系统语法(如Halliday,1966a,1966b)、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1967/1968)和语言作为社会符号(如Halliday,1978)等四个发展阶段(黄国文、辛志英,2012)。在此之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一直相对较为稳定(如Halliday,1985,1994a;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2004,2014;Matthiessen,1996)。

与此同时,众多语言学家在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句法分析

(如 Fawcett, 1980, 2008)、话语分析(如 de Beaugrande, 1991)、语篇分析(如 Halliday & Hasan, 1985; Hasan, 1984, 2005, 2012; Martin, 1992a; Martin & Rose, 2003; Martin & White, 2005)、体裁分析(如 Halliday & Hasan, 1985; Martin, 2000, 2001; Martin & Rose, 2008)、评价系统(Martin & White, 2005b)、语言教育(如 Halliday, 2007b; Hasan, 2011; Martin, 2012b)、自然语言处理(如 Bateman, 1990; Bateman & Paris, 1991; Fawcett, 1980, 2008; Fawcett et al., 1993; Halliday, 1995/2005;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2014; Matthiessen, 1990; Matthiessen & Bateman, 1991; Patten, 1988; Teich, 1999)的同时,也在不断对该学科理论进行改进和完善。

1.2 21 世纪初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情况

世纪之交,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提出“通过表意识解经验”的观点,形成了基于语言看认知的研究范式,开启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认知转向。这种趋势在进入 21 世纪后出版的《功能语法导论》第 3 版(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和第 4 版(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中得到持续体现,同时将这种认知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词汇语法及语篇结构与语义发生(semogenesis)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另外, Halliday (2006) 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定为一种“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理论,开启了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新阶段。

Martin 等人从篇章语义学(discourse semantics)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除了将语境层细化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将其分别与语类(genre)和语域(register)对应之外,还同时发展了韩礼德的人际意义,将其上升到语篇意义层面,通过对评价性语言的系统研究,提出了评价系统(Appraisal System)(Martin, 1992a, 2000; Martin & Rose, 2003/2007; Martin & White, 2005)。

与此同时,多模态研究作为社会符号学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研究对象包括:(1)绘画、雕塑、建筑等(O'Toole, 1994);(2)视觉图像、颜色语法以及报纸的版面设计和不同媒介的作用等(Kress & van Leeuwen, 1996/2006, 2001);(3)科技语篇和超文本的多模态特征(Lemke, 1998, 2000, 2002, 2009);(4)数学语篇中的多模态现象、多模态技术等(O'Halloran, 2000, 2004, 2005, 2007);(5)不同符号在多模态话语中的互补性(Royce, 2002)等。

与此相应,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也迅速跟进,介绍、阐释和运用国外同期的最新成果,并将其运用于翻译研究(黄国文, 2002a, 2002b, 2003b, 2004, 2005, 2009a, 2009b; 司显柱, 2004, 2005a, 2005b, 2008)、汉语语法研究(彭宣维, 2011)、多模态语篇分析(张德禄, 2009a, 2009b, 2009c)等。

1.3 近十年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最近十年,国外系统功能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范围,如Bowcher & Smith(2014)追述了系统音系学的近期发展,Ngo et al.(2021)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描写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并建构了肢体副语言的元功能分析框架,Rudge(2022)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描述英国手语(British sign language),Kim et al.(2022)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此外,国际学术界也不断尝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描写不同语言,建立了多语种的系统功能语法,如Lavid et al.(2012)将系统功能语法应用于描写西班牙语,Thomson & Armour(2013)系统论述了日语功能语法,Banks(2017)发展了法语功能语法等。这些研究推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纵深发展。

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在继续追踪国际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

一方面进一步凸显其作为社会符号学与适用语言学的功能,将其运用于多种类型的语篇分析,包括司法话语(刘承宇、汤洪波,2021;汤洪波、刘承宇,2021;王振华、吴启竞,2017)、教育语篇(赖良涛,2018,2019;于晖,2018)、科技语篇(杨信彰,2011,2019)、多模态语篇(张德禄,2009b,2010,2017,2018a)等。另一方面,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新创的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2018;赵蕊华、黄国文,2021)等研究范式,开启并拓展了生态语言学/生态话语分析(何伟、魏榕,2018c;何伟、张瑞杰,2017;黄国文,2017;黄国文、赵蕊华,2017)等。

其次,通过总结梳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中国渊源(胡壮麟,2018a)、马克思主义思想(何远秀,2016),以及语义发生学思想(肖祎、刘承宇,2014)、复杂自适应系统思想(谢翠平、刘承宇,2015)等,进一步丰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同时,针对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加强对汉语[如Yang(2022)和Fang(2022)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分别考察了现代汉语的情态系统和名词词组]及我国其他民族语言的研究(如王勇、徐杰,2011),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

此外,依托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开展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在基于语料库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面成就显著(如He,2019;Hunston,2013;苏杭、卫乃兴,2017)。

1.4 小结

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学,同时关注作为语言潜势的语言系统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与功能。作为一种适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高度关注语言的社会担当(social accountability),强调其可用于解决各种与社会有关的社会问题。该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学理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及时跟踪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当前我国社会文化语境，针对汉语及我国其他民族语言，广泛开展应用研究，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总结梳理其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运用语料库及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展跨学科 / 超学科研究，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不断守正创新。

第2章

功能语言学核心概念和表述

2.1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强调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结合语境（包括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研究语言系统及其使用与功能，其核心概念包括系统、阶与范畴、语言作为社会符号、层次、功能、语境、示例化、个体化等。本章将介绍这些核心概念，着重概述韩礼德等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的表述与阐释，为后续概览我国新时代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2.2 系统与层级

2.2.1 系统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Saussure（1915）最早提出语言系统的概念。此后，系统被大多数语言学家明确为语言的组合或结构。例如，Hjelmslev（1953）认为系统的底层为聚合关系，过程的底层为组合关系（胡壮麟等，2008）；Firth（1957）则把语言中的聚合关系称为系统，组合关系叫作结构。

Halliday 关于系统概念的理论发展可划分为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两个阶段。他认为，所谓系统，即由一系列特征组成的网络，该范畴主要用于阐释在一系列类似项目中为何出现这一个项目而非另一个项目（朱永生等，

2004)。系统是表征聚合组织的核心范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两个或多个术语（term）之间的对比性陈述，表征为特征（feature）；二是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入列条件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特征，或特征复杂体（feature complex）。系统可以形成系统网络，系统的每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体现陈述（realization statement）。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Halliday 把语言系统与构成语义层的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元功能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用途把语言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语义系统。每一个系统包括若干个语义成分，例如，概念功能对应及物性、语态和归一度系统，人际功能对应语气、情态和语调系统，语篇功能对应主位、信息和衔接系统，语言功能的系统网络系统如图 2-1 所示。而当系统的每一个步骤都实现后，便可产生语言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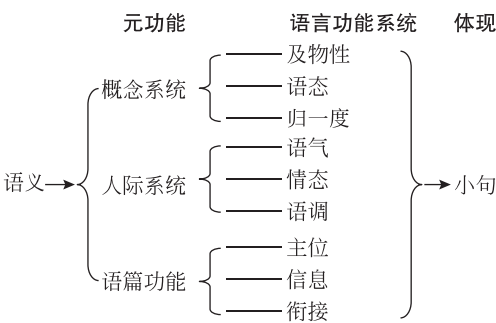


图 2-1 语言功能的系统网络（胡壮麟等，2017：45）

语言是人类使用最复杂、资源最强大、充满了各种意义潜势的表意系统（Halliday，2014），它在组合复杂性、聚合复杂性、层级复杂性、实现复杂性四个方面扩展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用精密度来说明，其中聚合关系是系统理论的源泉（李战子、程子航，2008）。系统存在于音系层 / 字系层、词汇语法层、语篇语义层等所有语言层级。系统与语篇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系统的存在是因为它是语篇的语义潜势，而语篇则是系统示例化的结果，两者的关系正如“天气”与“气候”的关系（Halliday，2014）。

语言的实际选择使用过程是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下对语言系统潜势的示例化表征，这种选择并非任意，它至少受以下三个条件的制约：（1）语言系统本身；（2）所要表达的概念意义；（3）社会语境，包括说

话者之间相互关系、交际意图、个体意库、文化差异等因素。系统的核心在于体验与意义，而这些都离不开在特定语境下对系统的选择，因此系统语法本质上也是功能语法。

2.2.2 层级

人类语言有诸多本质性特征，而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特征：元功能和层级化 (Halliday, 2014)。Halliday 的语言层级化理论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受哥本哈根学派 Hjelmslev 两个平面的理论以及伦敦学派 Firth 系统学说的影响。

在 Halliday (1985, 1994a, 1999, 2014) 看来，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包括多种层次或层级。语言本体从上到下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三个层次 (胡壮麟等, 2008)。值得注意的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法和词汇并非不同的层级，而是处于连续统的两端，称之为词汇语法 (lexicogrammar)。在第 4 版《功能语法导论》中，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将语言进一步细化为语境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位层、语音层五个层级；其中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为内容层面 (content plane)，音位层和语音层为表达层面 (expression plane)，如图 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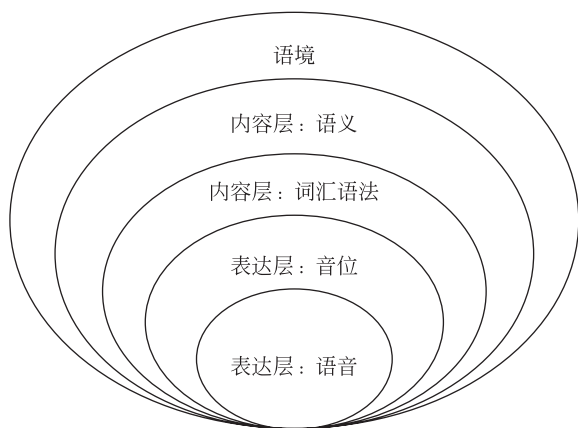


图 2-2 层级化语言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25)

Martin (2010b) 认为, 系统功能语言学过去 60 年中突出的贡献是对两个层级 (hierarchy) 和两种互补的研究。前者指实现化 (realization) 与级阶 (rank); 后者指元功能 (metafunction) 与纵横轴 (axis)。语言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有三种: 实现化 (realization)、示例化 (instantiation) 与个体化 (individuation), 这三种层次关系都是研究语言范式的理论资源, 而其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是实现化关系 (马丁、王振华, 2008)。

实现化将语言的不同系统组织为不同意义层级的抽象化过程 (a scale of abstraction), 即一种意义形式体现为另一种意义形式。具体而言, 对意义 (语篇语义层) 的选择体现于对形式 (词汇语法层) 的选择, 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 (音位层、语音层或字系层) 的选择, 高一级的层次由低一级的层次实现。每一个层次又分别对应一个系统, 每一个系统的构成成分又都分为若干层次, 如词汇语法层次由词素、单词、短语或词组、小句构成, 音系系统的层次成分包括音素、音节、韵步、调群等。示例化在具有意义潜势的系统与语篇之间形成连续统, 个体化则揭示文化意库与个体意库之间的意义潜势。三者结合形成了当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针对系统、语篇以及语言使用者研究的“三驾马车”。

语言是一种特殊社会符号系统, 它能够帮助人类识解赖以生存的社会。语言层级结构与系统通过三大元功能组织起来, 而它本身也要通过语境 (语言的外部功能) 才得以体现。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韩礼德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语境变量的分类以及这些变量有动因关系的语义结构上。具体而言, 语境变量中的语场 (field) 激活的是语义系统中概念元功能, 语旨 (tenor) 激活的是人际元功能, 语式 (mode) 激活的是语篇元功能。

语言层级的概念是受意义驱动的, 它可以将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拓展到语言的外部, 而在肯定成分关系为建构性意义资源的前提下, 凸显另外一种建构性意义资源——实现化, 很自然地实现了从对语言的结构主义认识到功能主义的语言释解的过渡。